

片纸千钧 言轻意重

——老科学家手迹中的高校发展建议与时代回响

□ 李美桂

今年高考已落下帷幕,莘莘学子即将填报志愿,报哪所学校、读哪个专业,正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。

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,便会发现——老一辈科学家们不仅潜心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,更心系国家高等教育的百年大计。走进中国科学家博物馆,翻开一封封泛黄的老科学家的亲笔信笺和手稿,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他们对高校发展方向、学科定位的深切关怀与远虑。其中的建议,与后来现实的变迁高度吻合。这种吻合,是源于科学家们超前的洞察,还是历史进程的巧合,已难下定论。但重读这些手迹,老科学家们对教育事业的拳拳之心和前瞻性的远见卓识,依然掷地有声。

周培源“红笔点将”： 把四位顶尖科学家 “按”到本科生讲台上



周培源

20世纪70年代,我国很多高校的教学科研工作陷于停顿,基础理论研究被贴上“脱离实际”的标签,大量科学家被下放劳动。其中,北京大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受到了严重冲击。

在这种氛围下,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公开提出“理科教育必须重视基础理论”,并逐一审阅、修改了多份专业教学计划。

20世纪70年代初,面对一份包含激光学、磁学、数学、半导体器件等专业课程的教学计划,周培源对任课老师进行了标注——激光学专业:杨荫荪讲;磁学:褚圣麟讲;数学系:段学复讲;半导体器件专业:黄昆讲。四位学者在当时都代表着各自领域的最高水准。

周培源的这份标注,并不是简单的课程安排,而是一场师资保卫战。在那个理论被轻视、教授被冷落的年代,他用自己学术领导人的权威,把四位顶尖学者“按”到了本科生的讲台上。这向全社会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息:中国的大学,不能没有基础理论;中国的尖端科技,不能没有大师。

正是这份标注,助力守护了激光学、磁学、数学、半导体器件4门基础核心课程的学术根基。多年以后,当中国开始向芯片、激光、磁性材料等科技高峰发起冲击时,也许有人回望历史时会看到这一行红笔书写的标注……

张维致信蒋南翔： 研究生培养应将质量放在首位



张维

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,1978年研究生招生工作也重新启动。此时,高等教育也处于关键发展时期,一份《高等教育汇报提纲》在教育部内部酝酿。1980年10月,清华大学内部的学习会上宣读了《高等教育汇报提纲》(1980年10月8日稿)。

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认真研读后,提笔致信时任教育部部长蒋南翔。在信中,张维充分肯定了该提纲的价值,但同时也提出3条建议,其中两条建议,后来在高校格局的重塑中得到了充分印证:一是研究生培养“不要在开始时面铺及太大”;二是不要“千校一面”地实施短期学制。

研究生培养“不要在开始时面铺及太大”

1978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工作,各大高校颇受鼓舞,斗志昂扬,准备全力投入。

张维注意到,研究生培养呈现“有些泛滥”的苗头。他认为,高考恢复之初,最重要的不是铺摊子,而是扎扎实实摸索经验,因此,他建议研究生培养“在初期阶段应先抓试点,在重点大学和一般大学重点学科摸索经验”。

张维认为,本科生教育尚且要强调教学质量,研究生培养更应将质量放在首位,不可盲目追求数量。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指出,1978年的

研究生招生规模已然“偏大”。

张维提出的重点大学与一般大学重点学科先行试点、分批推进的思路,与后来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径高度吻合。

不能“千校一面”地实施短学制

关于高等教育学制改革,《高等教育汇报提纲》中提出要办“两年制的基础大学和两三年制的专科学校”。

致信中,张维明确表示:“我十分赞成办二三年制的专科学校”,他认为这类学校的优势在于目标单一,功能明确——即培养面向生产、建设、服务一线的技能型人才。在当时,社会对中级技术人才存在大量缺口,两三年制专科学校学制短、见效快,能够有效补充人力资源结构中的短板。

但张维不赞成“两年制的基础大学作为我国办学形式之一”。他指出,从资源配置看,与其分散力量新建两年制基础大学,不如将基础课师资充实到现有四五年制院校,补齐这些大学基础学科弱的短板。至于主张借鉴美国两年制社区学院的建议,张维指出,美国已有相当多的四年制大学,而社区学院本质是职业教育,能转入四年制大学者寥寥无几,简单照搬只会得到低水平职业教育。

这封信写于1980年。今日回望,张维的审慎与远见,尤让人钦佩。他不是不要改革,而是不要急功近利地改革。他坚信:教育不能搞“大干快上”,也不能照搬外国模式。每一所大学的定位、每一种学制的设计,都要基于国家的现实情况,都要无愧于“质量”二字。

张维以一位老科学家的严谨与担当,在一封私人信件中,为我国高等教育的走向留下了冷静、理性而富有前瞻性的历史注脚。

千禧年一封院士联名信： 武汉应打造两所重点大学



杨叔子

2000年前后,我国高校迎来大规模“合并潮”——国家希望通过资源整合,打造一批综合性、研究型大学。

彼时,湖北武汉有30多所高校,其中武汉大学与华中理工大学(今华中科技大学前身)是实力最强的两所。当时流传多种合并方案:一种是将华中理工大学与同济医科大学等多所高校合并组建新大学;一种是将华中理工大学并入武汉大学……

以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(1993年至1997年任校长)为代表的院士们闻讯后十分焦虑,他们担心“简单吞并”会毁掉一所年轻大学几十年奋斗得来的根脉与活力。

2000年1月,杨叔子、熊有伦、潘垣(yuán)、张勇传四位院士,联名致信时任教育部部长、党组书记陈至立。他们表达了对华中理工大学合并之事的态度:赞成华中理工大学与同济医科大学、中南政法学院合并,并愿意为此竭尽全力;但不赞成与武汉大学并校,应该“办两个重点,而不是一个重点”——在武汉应当打造两所高水平大学,即便真要只办一所大学,也应以华中理工为主体。信纸上的字字句句,都是对一所大学根脉的守护。

最终,教育部决定华中理工大学与同济医科大学、武汉城市建设学院等合并,组建华中科技大学。2000年5月26日,华中科技大学正式成立。此后20余年,华中科技大学快速发展,跻身国内一流、世界知名大学行列。

或许很少有人知道,2000年的那个春天,几位院士曾在一封信中,用恳切而坚定的笔触,为这所大学的未来表达了一份深切的坚持。

十院士联名建言： 应建立新的温州大学



谷超豪

21世纪初,浙江温州以“温州模式”闻名全国,民营经济活力四射,750多万人口,是浙江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。然而,与杭州、宁波相比,温州的高等教育明显滞后——高校规模小、数量少、层次低。

2003年,以谷超豪为首的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签署建议信指出,温州的高等教育滞后是一个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”,要可持续发展,温州必须有一所像样的综合性大学。

当时,温州有温州医学院、温州师范学院和温州大学,都是普通高校,有较好的办学基础。但温州师范学院和温州大学,也各自存在明显短板。如果两校合并,优势互补,就有可能快速建成一所多科性、有一定水平的综合性大学。因此,他们向温州市委、市政府郑重建议,“温州师院和温州大学联合成为新的温州大学”。

信寄出后,温州市委、市政府迅速回应。2004年,合并工作启动。2006年2月,教育部正式批准。两校合并,一所崭新的温州大学在浙南闽北赣东大地上立了起来,成为那片广阔区域里唯一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。

笺纸无重,落笔成鼎。这封信承载的不只是一个城市的大学梦,更是一代科学家对教育规律的坚守、对家乡的深情、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。

本版图片由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提供

(作者系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研究员)

本版底图由AI制作